

科学中“错位”

——“科学实践”视域的思考

邢冬梅

内容提要 科学中的“错位”在方法论上源于赖欣巴哈的“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这种区分凸显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规范性作用。然而,由于这种区分脱离科学实践,受到了科学家的普遍质疑。21 世纪初,科学哲学家开始用“论证的辩护”去取代“辩护的语境”,使科学实践进入科学哲学的研究视域,使科学哲学不仅重构了“发现的语境”中具身性认知秩序,而且还展现出这种秩序是如何上升为“辩护的语境”中秩序的过程,从而消除了科学中的“错位”。

关键词 错位 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分 论证的辩护。

邢冬梅,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5123

1963 年,诺贝尔奖得主梅德瓦(Peter Medawar)在一篇题为“科学论文是一种欺骗吗?”的论文中指出:科学家的实验过程与他们在诸如著名的 BBC 之类节目中向公众传播的科普作品之间普遍存在着“错位”。也就是说,由于多数听众对于科学研究缺乏具身性经验认识,他们对科学的了解主要来自于教科书、科普作品、电视节目等,而这些传播手段主要是强调实验知识的确定性与可靠性,并且这种确定性与可靠性会随着知识在时空中远离科学发现过程的程度而大幅度地提高。柯林斯曾形象将其概括为“距离产生美”^[1]。梅德瓦认为科学家在其作品中有意地“错误”表达其研究实践。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符合哲学家提出的所谓的“方法论”要求,即把他们的研究置于归纳的框架之中,以让听众认识到科学是“一项伟大而智慧的工作”。然而,他认为这种语境源于一位非常错误的人——穆勒^[2]。在实际工作中,科学家并不会严格按照归纳方法行事,归纳主义的框架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可笑的紧身衣。“对于构成科学发现的思维过程,科学论文给出的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叙事,在这种意义上,科学论文是一种‘欺骗’”^[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实践哲学与地方性知识研究”(13AZD02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本体论’研究”(12BZX021)。

[1]哈里·柯林斯:《改变秩序》,成素梅、张帆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30 页。

[2][3]Medawar P. *The Strange Case of the Spotted Mice and Other Classic Essays on 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p.34, p.38.

从历史清算、普遍交往到世界公民

——卡尔·雅斯贝尔斯与汉娜·阿伦特的对话

金寿铁

内容提要 雅斯贝尔斯与阿伦特之间的对话持续了一生之久,正是彼此尊重和相互理解把最初的师生关系转变成了一种伟大的友情。本文重点考察了战后两人对话中所涉及的若干政治主题:罪责问题、交往与行为、人性、人类和世界公民等。与历史清算相关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他们智力对话的重要契机。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诉诸公开对话和精神之战,阿伦特行为理论诉诸积极生活和言说行为。他们的对话不是通过抽象化的人,而是通过具体的公共对话与普遍交往,提供了关于人类与世界公民的一个可以期待的范例。

关键词 罪责问题 交往 人性 世界公民

金寿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130033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与汉娜·阿伦特(1906–1975)之间的友情和对话持续了一生之久,堪称为20世纪哲学家之间伟大友情的典范。两人之间的最初对话可上溯至1926年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指导下准备博士论文的那些日子,1933年纳粹上台,两人对话随即中断,阿伦特因犹太人出身不得不流亡美国,雅斯贝尔斯因其妻子是犹太人出身,也开始了漫长的“内在流亡”。1945年纳粹德国覆灭之际,两人得以恢复书信往来,自1949年阿伦特旅行欧洲之后,两人书信往来日渐频繁,友情与日俱增,这种理解的对话与友谊如此深厚,甚至一直延续到1969年雅斯贝尔斯逝世为止^[1]。

作为20世纪一部珍贵的哲学史、思想史文献,这些书信为后世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政治生活和学术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鉴于两位哲学家的共同理论旨趣在于从理论上阐明人类生活中的交往和言说行为的重要性,本文不是聚焦于两人书信来往中个人生活的联系与差异,而是聚焦于两人“理论”生活的联系与差异,具体地确认与时代问题息息相关的共同问题意识和思维轨迹。为此,本文依次考察下述三个问题:第一,从理论与实践视角考察纳粹德国覆灭前后的热点问题,亦即与今日历史清算有关的“罪责问题”;第二,从精神与政治视角考察使人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交往”与“行为”;第三,从实践政治理念视角考察“人性”与“世界公民”;最后,理论联系实际,简要阐明他们的个人

[1]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 Herausgegeben von Lotte Köhler und Saner,München /Zürich, R.Piper,1993.

伦理忧患及其文化形态

刘 波

内容提要 人类精神生活及其同一性是人类生存的最后文化防线,这道文化防线以伦理忧患的方式伴随着人类发展进程。在文明史上,伦理忧患常以“道德咒语”的方式对历史发展进行反思。中西方文明中具有终极意义的伦理忧患是“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将会怎样?”和“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当下的“后”意识是人类对自身延续的精神链和文化链的伦理忧患。伦理忧患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对以物质力量为主导的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诊断、道德批评和文明预警,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平衡力量。

关键词 伦理忧患 道德咒语 “后”意识 文化形态

刘 波,东南大学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210096

“我们为什么在一起”和“我们如何在一起”作为文明的基本问题,其核心是伦理忧患,对于这两个透着幽远忧患意识的根源性问题的探索与回答构成人类的思想史精神之流,成为我们面对未来的文化后方和思想资源。人是一种文化存在,个体的人在其所构筑的社会系统中寻求生存的理由与勇气,安身立命,作为整体的社会则追求系统的秩序与公正,由此建构一个精神的家园、文化的归属地,让人的存在获得意义。包尔生说过:“每种动物都希望过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这种天赋性质在冲动中显示自己,支配着动物的行动。这个公式同样适合人,他希望过一种人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包含人的一切,也就是说,过一种精神的、历史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为所有属于人的精神力量和性格留有活动空间”^[1]。这一精神家园和文化属地是作为个体的人和整体的社会的共同文化防线,其以伦理忧患的文化形态为表征,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的生存状况紧密关联。

一、文明进程中的伦理忧患

人类社会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人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又生产出的一套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的构成框架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三足而立的文化世界。政治向度考量的是如何使人类的制度最优化,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合理秩序;经济向度主要考量是如何分配和增加财富,最终提高人类的整体社会福利;而从文化向度则透视社会和人的存在,提供指导人类活动的价值系统。按照丹尼尔·贝尔

[1]转引自,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6 页。